

文化名人坊



赵建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画面从此定格为历史长河中的永恒经典,艺术家们也纷纷用画笔记录这一伟大时刻。

从2012年到2021年,著名画家赵建成用近十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两幅描绘开国大典的艺术巨制,分别为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换了人间——1949·北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开国大典》,在为历史留下珍贵视觉记忆的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画的传承创新树起一座新的丰碑。

■ 近三万张照片里的时代表情

2017年,“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圆厅正中间的一整面墙,前所未有的留给了这幅大型人物画——《换了人间——1949·北京》。这幅长18米、高3米的史诗巨作,荡气回肠、栩栩如生地描绘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63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肖像。它在美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也让来到现场的观众惊叹不已。

这是一幅历时五年创作的画作,对史料的深入研究与考证占据了赵建成大量的时间。面对人们都十分熟悉的开国元勋,如何能够更加深刻地塑造人物的形象与性格,成为摆在赵建成面前的重要课题。为了搜集到1949年开国元勋们的形象,赵建成来到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资料室,那里有许多珍贵图片资料储存在地库,身着军大衣的他在极低的温度下亲眼看到了许多黑白照片原片,与身处重要历史时刻的众多人物

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搜寻近三万张历史照片,画出百幅人物素描……赵建成以严谨的态度“啃”下了海量的史料与文献,但是,照片只是创作的参考,画家还要了解历史人物的形象与性格,准确捕捉其在历史情境中的心理、姿态、表情。“对每一个人物,我力求综合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个人命运等多方面因素,立体地进行观照,塑造出他们的精神世界。”赵建成说。

在这幅画的创作中,赵建成没有侧重于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场景描述,而是转换视角,通过对这63位开国元勋的人物肖像和内在精神品质的刻画,体现一个时代的集体表情。画中的每个人物,并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上,但他们都与1949年的北京,与处于历史转折点的中国有密切的关联。正如浪漫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所说:“历史画创作实际上是画家依据历史的文本,像导演一样进行一次再创造。”

驾驭如此大型的创作,对画家的学识、画功乃至体力而言都是极大的考验。“当时,我同期还在创作中华文



《换了人间——1949·北京》

画家赵建成以艺术作品为国家留下视觉记忆 丹青绘就光辉历史时刻

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民族会盟——七溪会盟图》,两幅画的题材分别属于古代与现代。我每天绘画的时间从白天持续到深夜,后期胳膊甚至都有些抬不起来了。”但喷薄的创作激情让他忘却了疲惫,画中的人物让他倍感鼓舞,那是面对时代的呼唤挺身而出的勇气,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担当。

■ 绘出不同于前人的《开国大典》

2019年下半年,赵建成接到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的邀约,请他创作《开国大典》这一重中之重的历史题材中国画,尺寸要求为高4.2米、长12米,时间限定在一年半内完成。“党史专家为《开国大典》的创作确定了三个原则:描绘开国大典仪式;体现天安门元素;尊重历史事实。”如此重大题材的画作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创作,赵建成感到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在大多数国人的记忆中,开国大

典画面都是黑白的,而且镜头不多。直到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俄罗斯为中国准备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一部名为《重生》的纪录片。其中首次公开的开国大典彩色画面,让赵建成惊喜万分。他将纪录片反复观看了近百遍。“影片中,大典现场可谓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天安门城楼上的人物有的自然站立,有的将胳膊撑在栏杆上。”

尽管有了可参考的历史影像,但画家不能照搬纪录片中的场景。董希文、唐勇力等画家已围绕开国大典创作过经典佳作,如何找到新颖的构思立意,让赵建成陷入了思索。茫然中,延安时期的一张老照片令他茅塞顿开,图中用木头架起的土台子站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聂荣臻等人,摄影师自下而上取仰角的拍摄,只见身躯看不到人物的脚,人与台浑然一体。

“台”的寓意成了赵建成创作的灵感来源,他将这些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伟人群像,雕塑般地立于汉白玉雕栏的台阶之上。台阶由此演化为一个坚实而厚重的底座,托起了新中国

的希望。台阶平行的横线与人物站立的竖线形成了《开国大典》画面的基本框架,凸显出崇高感、稳定感和纪念碑式的意味。

2021年,赵建成的《开国大典》如期亮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并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画作在运用中国传统笔墨造像的同时,又融合了油画般的光影质感与雕塑群像的意味,折射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成为继董希文、唐勇力作品之后,第三幅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开国大典》。

■ 以画笔关注历史与现实

上世纪60年代,17岁的赵建成成为兰州军区农建第十二师的一名战士,自此扎根高原11年。他常常背着画板,行走在茫茫大地之上。上世纪70年代,他师从朱乃正先生学习绘画,后专攻中国画人物画,凭借《铺路石》《厚土》《金秋》《魂系雪域——孔繁森》和《西部放歌——灵光》,连续五届

在全国美展获奖,蜚声于中国画坛。

也许正是早年携笔从戎的经历,铺垫了赵建成的人生底色,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民生,是他笔下绕不开的话题。他经常深入西藏、甘南等地区写生,感受各民族同胞的生活,并创作了《西藏系列》;2007年起,他多次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了《国共合作——1924·广州》《民族会盟——七溪会盟图》《康熙西征图》等一大批丹青巨制,两幅描绘“开国大典”的画作,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

赵建成广受赞誉的创作,还包括《先贤录》系列肖像,从康有为、蔡元培、弘一法师到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人物,一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跃然纸上。赵建成说:“描绘这些文化名人的过程也是与他们进行精神交流的过程。我会因他们的思想而激动,也会因他们曾经鲜活的生命而感动。”

“我们这一代画家的成长与新中国的发展同步,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巨变,这样的经历也塑造了我们心底的家国情怀。”赵建成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以画笔关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讲述中国故事是自己的责任。“中国人物画经历了漫长的寂寞,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我想创作更多的作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更多视觉的记忆,为那些不朽的灵魂和感人的故事树碑立传。向着这个目标,我仍然在路上。”

王广燕/文 黄欣笛/图

今年是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诞辰111周年。从1938年任职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到1944年赴英宣传中国人民抗日事迹,再到1951年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叶君健投身对外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他通晓英、意、法、德、丹麦、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一生为世人留下了500多万字作品和300多万字译作,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为几代中国读者提供了心灵滋养。

20世纪初,国家危机促使人们寻求变革,“别求新声于异邦”,造就了蔚为壮观的出国潮。在20世纪40年代的旅英者中,叶君健是杰出的一员。他不仅“求”新声,更“传”新声,以独特的抗战演讲与革命书写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考察这一时期叶君健在英国的中国叙事与跨语际实践,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他浓浓的家国情怀。

叶君健:

别传新声于异邦

■ 在英发表抗战演讲600余次

1944年10月,叶君健通过英国牛津大学道兹教授介绍,应英国战事宣传部邀请,赴英宣传同盟国的抗日斗争,鼓舞英国国民抗击法西斯的士气。2022年新出版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记载,叶君健“每月约三星期在外,演讲及参观。一星期回伦敦休息。”(1944年10月12日)“中午在香港楼请叶吃饭。叶昨天方回。这次在外面两个多星期,演讲了四十多次,至少每天两次,有时三次。听众少亦二三百人,多的千人以上。每次演讲及讨论至少两小时。有些人跟了他跑,他到某处去讲,有些人即去听。”(1944年11月14日)“十二时半,滢与格温、布斯夫人等去China Institute。叶今日讲‘今日中国’,讲的是中国抗战时的人民生活。”(1945年1月17日)

叶君健是陈西滢的学生,从后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叶君健在英国公共演讲之勤。他的演讲以中国人民的战时生活为中心,包括中国的人民武装如何拖住日本侵略者。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英成为同盟,但英国社会对中国并不了解。1943年12月17日,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参观英国考文垂菲儿新村的一所小学时,正值上课,同行的温源宁问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学生:“中国的书都在哪里?”学生回答:“日本。”王云五感慨:“此固不能谓一般小学生之常识如是,惟英国学校向来对东方不甚注意,可于此见之。”虽然20世纪上半叶,狄金森、燕卜苏、罗素、阿瑟·韦利等英国文人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度尊重,但此时多数英国民众对中国所知甚少,有的认识还停留在古代。

为扭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向英国社会宣讲中国抗战现状、促进中英

文化交流,叶君健深入学校、工厂、兵营、医院,在英国各地发表抗战演讲600余次。这既鼓舞了英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志,又大大改进了英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 用创作与翻译传递革命声音

除了在英国进行巡回演讲,叶君健还不断通过英文创作与翻译向世界传递中国革命的声音。二战结束后,他以研究员身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其间用英语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山村》等作品。1947年由英国西尔文出版社发行的《山村》以叶君健故乡、具有“将军县”之称的湖北红安县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湖北偏远山村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称“我”(春生),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视角,呈现了20世纪20年代闭塞山村底层人民的生存现实,打捞出被大历史淹没的凡人悲歌,揭示了中国人民如何一步步走向革命道路。

《山村》被英国笔会选为1947年最佳小说,后来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冰岛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尔杜尔·拉克索奈斯评价说,《山村》揭示了一个超级庞大的国家里的革命在农村中如何开展。“《山村》挪威文译者汉斯·海堡说:‘我一直在寻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那些在大众中活动但不一定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或英雄气质的普通人,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那些代表中国、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最终,我在《山村》这部小说中找到了他们。在阅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似乎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关于中国的某些真实的和诚挚的东西。’”这些对《山村》的评价凸显出小说的文学价值与革命意义。

《山村》是叶君健《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他庞大的海外文化传播工作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叶君健就在香港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学。他还在1939年率先将毛泽东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译成英文在乌拉圭出版,及时向海外传播中国革命理论。

1944年至1949年旅英期间,除《山村》外,叶君健还把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张天翼、姚雪垠、刘白羽等人的作品组成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翻译为《三季故事集》,1946年由伦敦敦达斯出版社出版,被外国评论家视为世界上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品集。新中国成立后,叶君健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主编长达25年,向世界推广解放区文学,这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文学与中国革命功不可没。

叶君健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传播和对中国革命的思考来自其坚定的和平主义信念。叶君健出生于湖北农村,家境清贫,屡遭变故,早年便创作了《岁暮》《被遗忘的人们》,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关注。1936年7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叶君健东渡日本,不久便加入日本世界语协会,为世界语“世界和平”“人类理解”的理想所吸引,希望以此表现受压迫民族与阶层的生活与思想。叶君健在1936年11月29日给自己的老师朱利安·贝尔的信中谈到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将经历巨变。我认为我必须参与即将到来的大战,否则我就太自私了。如果法西斯控制了整个世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法西斯破坏一切文化。”回国后,他便参加了由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接待来华作战的国际友人。同时参与发起



叶君健(右)与挪威剧作家、《山村》挪威文译者汉斯·海堡在一起。

■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叶君健在英国社会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传播得益于世界形势及中英两国关系的转变,更离不开他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抵达英国后,风华正茂、谈吐不凡的叶君健,很快融入了英国文化界的大门。旅英期间,他与朱利安的母亲瓦内萨、弟弟昆汀·贝尔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成员有较多交往,被称为“布鲁姆斯伯里学派中的一个中国人”,并被英国文豪普里斯特利称为“我家里面的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叶君健所在的国王学院正是朱利安的母校,这所由英王亨利六世于1441年建立的学院是剑桥大学30多个学院中最著名的学院之一,拥有大批造诣非凡的学者,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这里也走出了徐志摩、蔣经、温源宁、黄佐临等中国著名作家与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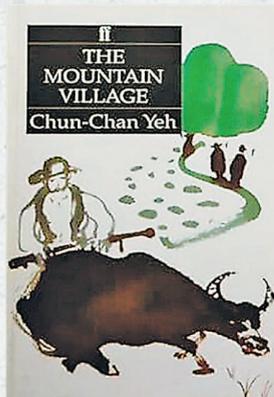
1982年,叶君健再次访问剑桥,就“中国当代文学”与“英国文学在中国”做了两次精彩演讲。前者以时间为经、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为纬,梳理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与现代文学的联

系、发展历程与趋势,穿插了对重大文学事件与历史事件的思考,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系统性总结,体现出一个高屋建瓴的批评家所具有的风范。后者同样以时间为序,讲述了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从清末民初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对英国现代戏剧艺术和音乐的关注,肯定了英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

叶君健此次访问剑桥也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包括“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作家普里斯特利一家,老朋友李约瑟、瓦尔特·亚伦等人。其中有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是特里克·韦金逊教授。当年,叶君健初到国王学院时,是韦金逊接待了他。现在又是韦金逊在国王学院为其保留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他。只是此时的他头发稀疏,腿脚也不灵便了。两人心里不由感叹,这一别就是37年。

叶君健等旅英现代作家,以戏剧、绘画、写作、报道等不同形式为祖国发声,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富于韧性的跨语际实践。在中国文学与文化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当下,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别传新声于异邦的先行者。

徐从辉



《山村》书封。